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西北汉语方音纲要

[美] 柯蔚南 著
张建军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西北汉语方音纲要

〔美〕柯蔚南 著
张建军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译者说明

《西北汉语方音纲要》是美国爱荷华大学著名汉藏语言学家柯蔚南 (W. South Coblin) 于1994年发表的, 刊登在王士元先生主编的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杂志上。英文原题为“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本书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言, 主要讨论一些相关历史问题和分析呈现材料的结构框架。第二部分西北汉语音韵历史概略, 勾画出古代西北汉语方音声韵系统的发展。第三部分材料, 以表格的形式呈现所搜集到的材料, 并直接与高田时雄先生的材料进行比较。其后附汉字拼音索引、引用人名和文献的缩略形式及参考资料。

为了便于阅读, 译者将参考文献以文中注解的形式列出。

本书采用的云龙国际32位音标输入法4.0版。

张建军

2017年12月

原著序

这本纲要的写作最初得到罗杰瑞教授的建议，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不断地给予鼓励。许思莱教授也给予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二人给予我本人巨大的帮助。但是无法避免本文仍有一些不足和错误。

本文的出版得到爱荷华大学亚洲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支持，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

〔美〕柯蔚南

1994年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言

- 第1章 关中和河西走廊一带历史概况 003
- 第2章 历史资料的来源及版本 009

第二部分 西北汉语音韵历史概略

- 第3章 上古到隋唐长安时期021
- 3.1 声母021
- 3.2 韵母029
- 3.3 声调035
- 第4章 隋唐长安时期到沙州及晚唐长安时期036
- 4.1 声母036
- 4.2 韵母044
- 4.3 声调051
- 第5章 中古到现代的西北方言053
- 5.1 序言053
- 5.2 声母058

5.3 韵母	064
5.4 声调	070

第三部分 材料

1 果假摄	073
2 遇摄	091
3 蟹摄	110
4 止摄	129
5 效摄	158
6 流摄	168
7 咸摄	181
8 深摄	191
9 山摄	196
10 臻摄	227
11 宕摄	246
12 江摄	263
13 曾摄	266
14 梗摄	275
15 通摄	292
材 料	308
汉字拼音索引	308
引用人名和文献的缩略形式	328
参 考 资 料	330

第一部分 | 绪言

导论

20世纪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文本材料。这两种材料应该反映了两个时期的语音，即公元前900年（传统上称为“原始”或“上古”汉语）和公元600年（传统上称为中古汉语）两个时期。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两个语言时期表明汉语从最初的形式到多种现代方言的发展是连续的、直线型的，但这一看法仍有争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方面的最新研究主要是关于现代汉语方言语系的研究和原始汉语音系的重构，如原始粤语、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原始吴语等。这种类型的研究主要针对南方汉语方言群。在几乎缺乏早期书面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唯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但是，用比较法来研究这些已被公认历经千余年外界影响的语言是否可行，已逐渐成为本学科领域讨论的主题。

相较于南方方言的研究情况来说，针对北方或“官话”方言的长期历史的研究则较少。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能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成规之下，尤其对于西北方音研究而言，这无疑是个遗憾。因为我们恰好拥有关于西北方音的大量的、悠久的文献资料。现阶段，有好几个大规模的方言调查研究材料可资借鉴。在大约公元900至1000年，我们不仅有丰富的汉语材料，而且还有大量的藏语、于阗语、粟特文等语言的文字手稿。它们记录

的不只是一种方音，还集中记录了一些略有差异的方音。在早期的几个历史阶段，我们有一些不完整的用藏语书写的材料，也有本地的汉语材料，以及大量的佛教抄本。在这些材料中汉字常被用来记录人名、短语，以及用梵语和各种古印度语书写的大段经卷。实际上，这些抄本可以追溯到公元400年。一些关于西北地区的零星材料，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300年。总之，西北汉语方音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同时避开了干扰其他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些“陷阱”。

然而上面的讨论并不是表明，西北汉语方音是一块完全未开垦的处女地。正相反，特别是我们从之前10世纪藏汉对音材料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在这方面，罗常培（1933）^①和Csongor（1960）^②的早期研究成果尤其重要。他们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已经弥补和替代了高田时雄（1988）^③的研究。特别是高田时雄近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9至10世纪西北汉语方音音韵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我们已经尝试勾勒西北方音中世纪晚期的情形，并试图追溯到上面提到的早期阶段。^④在此，我们主要做的是考察一些特殊的理论问题，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引用我们的材料来解释一些问题。但这个方法并不能凭借大量未发布的材料向读者揭示西北方音的全貌，致使读者也无法亲自评判这些语料。目前的研究工作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

因此，我们研究的意图是以一种实用易懂的方式呈现这些材料，同时尽可能地与高田时雄先生构建的框架结构保持一致。鉴于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一些相关历史问题和分析呈现材料的结构框架。第二部分进行历史回顾。第三部分将以表格的形式呈现所搜集到的材料，并直接与高田时雄先生的材料进行比较。高田时雄通过传统等韵图的“摄”来安排这些材料。我们在本书中会用汉语拼音索引来作为补充。

① 罗常培.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上海.

② Csongor B.1960.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 in *AOH* 10.pp.97-140.

③ 高田时雄.1988.敦煌资料和汉语史的研究.创文社,东京.

④ Coblin W. South.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1991.

第1章 关中和河西走廊一带历史概况

可能曾经在某个时间存在着一些语言社团，它们跟外界完全隔绝，因此其语言的演变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但是显而易见，大多数语言或方言在其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与外界有过接触。毫无疑问，早期的西北汉语方音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因此，值得我们考虑的是西北的历史状况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语言的变化。

直到汉代，敦煌和河西走廊地区才算得上归属于讲汉语的中原汉政权。另一方面，关中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原文化一个大中心，而且周代中期它就是秦国的政治中心。《左传》中提到秦国所用语言与东边诸国所用其他语言不同。公元前614年，秦国在黄河西岸国境内部署了军队。一个名叫魏寿余的人冒充秦国使臣出使魏国，在晋国境内渡过了黄河到达魏国。他对秦国国君说：“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现在普遍认为，这个时期在王室和朝廷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或标准的语言。并且来自不同地区的王公大臣在朝堂上能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自如地进行关于人际和政事的交流，这也说明当时存在一种通用的语言。另外，有人认为《论语》中提到的“雅言”（用一种正确或优雅的方式说话）^①是当时标准语的一种参照。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可以假设来自秦国和其他地方的官员在场时，秦国国君和魏寿余就用这种标准语会谈。在这样的背景下，《左传》提到的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想去魏国，与当地官员交流时，为了便于理解，他肯定会用当地语言跟他们交流。一个秦国人无法用雅言或者其方言直接和他们交流。

秦国统一全国和后来汉朝选择定都关中地区的长安后，秦方言的重要性和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在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所著的《方言》地图中也有一种提示，“秦晋方言”被看作关西方言群当中关系最紧密的两个方言。^②

然而即将发生的变化出现了。公元2世纪的人口普查表明，长安地区及整个渭河流域人口曾经非常稠密。但是公元140年人口普查显示，两地的人口减少了

^①《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② Serruys, Paul L-M. 1959.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Berkeley. 86-7.

70%，大约有650万人。^①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东汉建立后迁都洛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游牧民族南匈奴和半游牧民族羌的压力，他们不断地对渭河河谷侵扰和破坏，导致当地农民大规模南迁。^②东汉时期羌族大规模内迁，最后定居在西北边疆和关中境内。公元185年和187年，羌族和叛乱的汉民联合起来，对长安构成了威胁。汉末晋初，羌族的影响仍旧继续，事实表明到4世纪其在关中的人口不少于一半。^③有人也许认为这种情况影响了该地区语言格局。东汉末年，政坛动乱引发了其他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最近周振鹤和游如杰（1986, 2006）注意到，在东晋首都洛阳被破坏后，大军阀董卓于公元190年从洛阳迁徙数百万人口（原文如此）到长安。^④五年后，长安也被放弃了，而这些移民四处逃散。以上事件很可能也影响关中方言的形成。

汉武帝为了断绝匈奴和西北地区及羌族的联系，进一步向河西走廊扩张。^⑤公元111年设立敦煌郡。保塞安民不仅靠军队，而且更要凭借屯田制度的建立。实施这些措施，就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强制移民。据史料记载，河南、河北、山东58万人被迫迁往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⑥中亚出土的汉代军队详细活动材料证实了这一点。通过调查在敦煌和居延服役的汉代军队士兵的来源地，Wolfram Eberhard（1967）发现，除当地应征（来自甘肃本地）的军人外，其余的56.7%来自河南，24.9%来自河北，6.9%来自山西，6.9%来自陕西，4.7%来自西南地区。^⑦这表明，正如所料最早影响甘肃地区汉语发展的不仅有关中方言的西进，而且包括某种混合方言的传播，很可能受到了中原汉语的极大影响。

公元2世纪，由于羌族不断骚扰，东汉政权统治西北支出巨大。公元107—122年当地汉民大批向东迁移。^⑧后来，伴随公元120年敦煌郡的设立^⑨等许多政策，当地政权得以重建。但是如上所述，与羌族战乱不断，一直持续到东汉灭

① Bielenstem Hans.1947.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A.D." in *BMFEA* 19.135, 139-140.

② 《剑桥中国史》，1:270.

③ 《剑桥中国史》，1:426.

④ 见《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8；又见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0.

⑤ 《剑桥中国史》，1:424.

⑥ Lee James.1978. "Migration and Expansion in Chinese History." In *Human Migration*. William H. McNeill and Ruth S. Adams(eds.), Bloomington and London.pp. 20-47.

⑦ Eberhard Wolfram.1967. *Settle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Hong Kong. pp. 80-83.

⑧ 《剑桥中国史》，1:421.

⑨ 《剑桥中国史》，1:303.

亡。有趣的是，总体上政权的退出丝毫没有导致汉族平民离开西北。相反在东汉末期，凉州（今甘肃）的汉族和羌族像邻居一样和睦共处。凉州的汉族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亚习俗和物质文化，他们却被中央政府和官僚们视为叛国的“野蛮人”^①。有人也许想知道，如果河西走廊这种多元文化格局对语言没有影响，或许会出现类似现代西宁汉语方言中的“藏化”现象。

汉末由于连年战争和灾祸，大量民众迁移和死亡，西北的汉族人口大幅度减少（CHC3-1:5）。^②公元3世纪后期，长安成为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③时隔约150年之后，长安于公元350年至417年再次作为政治中心兴起，成为前秦和后秦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都。这一时期关中地区兴盛的佛教文化向西延伸到河西走廊，并进入中亚腹地，同时加强了与南方佛教中心庐山和建康的紧密联系。有趣的是，与佛教共存的传统儒家文化研究也在贵族中盛行。^④在西北大规模翻译佛经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许多对音材料，这些是我们构建古代西北汉语方音的基础。公元417年后秦政权衰落，关中的佛教团体也随之解散了。

公元535年，长安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西魏（535—557）和北周（557—581）的首都。据说，覆盖关中和甘肃的西魏文化有着浓郁的中亚特色（CHC3-1:54）。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刘伶（1988）认为同一时期，今河南和湖北有大批移民被迫迁往河西走廊。^⑤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决定离开长安城，在东南方几公里处建立了一个新首都，命名大兴城，于公元583年投入使用。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大兴城被重新命名为长安。到公元609年，关中的人口大大增加。^⑥我们认为部分原因是，公元581年后大量的移民进入该地，其中也许有来自中国东部大城市的上层阶级。当时与陆法言一起讨论和整理《切韵》一书结构的似乎正是这些上层人士。在早期西北汉语音韵材料中，隋唐之际的阇那崛多（Jnanagupta）译经对音材料和颜师古的反切注音是我们构拟隋唐长安地区声韵系统的基础。

在公元609年至742年间，关中地区遭遇了10%的人口损失。但是随后，一直到11世纪，该地区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CHC3-1:23）。唐末由于忽视了农

①《剑桥中国史》，1:433-434.

②《剑桥中国史》，1:5.

③ Zürcher E.1959.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p.65.

④ Zürcher E.1959.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pp. 200-201.《剑桥中国史》，1:841,847,852.

⑤ 刘伶.1988.敦煌方言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pp.1-2.

⑥ Bielenstem Hans.1947.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A.D." in *BMFEA* 19.125-163.

田灌溉系统，长安周边地区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公元9世纪后期，在黄巢起义期间，长安遭到严重破坏。公元904年，唐都长安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朱温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同时大量人口被驱逐。^①

五代及宋时期，开封成为首都。长安和西北变成了一潭死水。公元1074年的石碑记载，当时长安地区的人口达到数万。我们可以拿此和1911年约10万人口的西安作以比较。^②

河西走廊是唐帝国西部辖地最重要的地方，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军队撤出河西走廊。在公元756至763年，吐蕃抓住时机，乘机占领了河西走廊。直到公元851年，吐蕃军队被张议潮的归义军赶出了敦煌。在此期间，甘肃的汉族人口大部分留在原地，并和吐蕃统治者像邻居一样和睦共处。这段时间前后，敦煌出现了大量的藏汉和于阗梵汉对音材料和词汇集。我们关于沙州方言（或者高田所谓的河西方言之后）的信息基本上来自这些材料。

唐元之际，河西走廊基本上处于西夏王国的统治之下。最近我们知道的关于早期西北方音的对音材料就来源于这个时期（龚煌城1981;1989）。^③之后，河西走廊纳入元帝国的版图。公元1370年后，河西走廊处于明朝政府的控制中。然而，据《敦煌县志》记载，在1520年吐蕃入侵敦煌地区，造成了该地巨大的人口断层。^④我们也注意到，明代陕西地区于公元1437年后，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在17世纪30年代该地又陷入了骇人听闻的经济和军事危机。明代早期长安（现更名西安）。在元代或明代某段时间（详情不详）有大批的回民进入关中地区。^⑤

清代朝廷主张向遥远的西北扩张，而河西走廊自然是进行扩张的通道。公元1723—1727年间，清朝政府在敦煌设立了卫所，同时迁入大批居民开发敦煌。这些移民有来自河西走廊和其他西北地方的，也有来自甘肃东部和关中地区的。他们按照来源地住在一起，从而形成敦煌双方言的特点。一种方言是由住在党河以西和敦煌城西南居民说的河西话，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该方言属于河西走廊方言；另一种是由住在党河以东的居民说的河东话，属秦陇方言或陇东关中方言。这样就形成了甘肃西部的一个“东部方言岛”。^⑥

① 陕西省博物馆.1959.西安历史述略.p.115.

② 陕西省博物馆.1959.西安历史述略.p.115.

③ 龚煌城.1981.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2.1.37-78.1989.

④ 刘伶.1988.敦煌方言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p.2.

⑤ 陕西省博物馆.1959.西安历史述略.p.119.

⑥ 刘伶.1988.敦煌方言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p.2.

除1646年2万满族军队进入西安外，没有材料表明清代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关中。^①和中亚各国之间不断的商业贸易往来，以及军队调防西北，都要通过该地。特别是西安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山西和陕西商人经过西安把各种货物运到兰州。^②很可能这个特别的“山西纽带”仅仅是更大“画面”的一部分，因为清代山西商人的垄断地位在陕北已经建立起来，这和晋语的扩散有紧密联系。^③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外部语言特征进入关中地区，随之进入河西走廊地区。

汉语历史音韵的不同发展阶段传统上被看作是独幕剧中接连出现的一个个场景。但是，我们从上面概括的材料看出，即使在这个国家一个相当局限的地区，此种发展模式可能并不现实。河西走廊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一开始针对的就是一个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的地区。局势动荡引起了大量的人口逃离该地区，从而导致人口严重减少。相反，甚至适量人口的涌入可能会对该地区语言局面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已经发现，显然河西走廊被安置了大量来自各地操各种方言的民众，其中中原方言可能最典型。但是不久又迁入了操藏缅语的羌族，并且数十年来当地汉族和羌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后来，又有大量有据可查的人口迁入，但对于这种移民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仍旧不清楚。所有这些情况最终勾勒了沙州时期当地方言的概貌，我们发现这在藏汉和其他对音材料中也有所反映。但是从汉代到晚唐，该地汉语形成的确切过程依旧无据可查。我们无法知道《敦煌词汇集》中的纯口语究竟与汉代屯田移民所操的汉语方言有怎样的关联。再者，我们知道后沙州时期敦煌地区多年处于非汉族人的统治中。到清代时，因朝廷政策有大量新移民进入敦煌地区。正因为此，高田时雄（1988）认为，现代敦煌方言不能被简单看作是从沙州方言直接传下来的。^④实际情况远比此复杂。而且我们应当知道，数百年来河西走廊是大批的士兵、官员、商人、罪犯、流放人员等经过的一个大通道。所有这些活动和语言扩张对如此狭小的地方口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最后，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甘肃中古晚期方言和某些现代晋方言的口语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⑤这种情况表明，在甘肃或关中和山西地区曾经有

① 陕西省博物馆.1959.西安历史述略.p.119.

② Rozman, Gilbert.1973.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216.

③ 侯精一.1989.晋语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pp.12-13.

④ 高田时雄.1988.敦煌资料和汉语史的研究.创文社,东京.pp.7-8,186-9.

⑤ 王洪君.1987.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1.pp.24-33.侯精一.1989.晋语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pp.125-133.

一个语言连续体，后者保留了许多较古老的语言面貌，而前者由于外部影响，语言经历了调整和变更。这个问题超出了当前的研究范围，它或许在未来很重要。

关中地区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这里还不能轻易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曾经是华夏祖先的发源地，当时人口非常稠密，但是在某时期大量居民外迁，或许多外来操非汉语的居民迁入。突然有一天数百万人进入长安地区，五年后又突然消失了，这会产生多大影响呢？我们知道战乱年代大量的关中原住民逃离了该地区。但是后来该地区人口又“恢复”了。这些新居民是从哪里来？操的又是哪种方言呢？近年来学者们已恰当地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最终解释所谓的官话方言强大的“同质性”。^① 现在的“西北官话”很容易被来自于中原的人理解，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原始语言，还在于它与早期内部的移民格局有关。

^① 周振鹤，游如杰.1986.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p.24.

第2章 历史资料的来源及版本

我们的数据集中在下面第三部分，它们是根据“高田目录”（Takata List）编排的。即关于公元9、10世纪西北汉语方音对音形式的1218张综合表，这是由东京高田时雄教授（1988）在全面研究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①

我们直接依据的数据来自高田时雄的“目录”，这些来自“目录”数据按适当的数字被编排在一起。目前，对于没有出现在高田著作中的音节，以插入或者在条目之间编号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高田根据中国传统等韵学上的“摄”和“韵”来安排这些材料，这就为查阅数据中的单个读音形式提供了方便。拼音索引作为一个供选择的查阅方式附在文后。现在，我们将逐行讨论这些数据条目的格式。

主要条目行

每个主要条目第一行以“高田目录”中的相关数字开始，并附有汉字用来描写要讨论的音节。接着圆括号里是一个或多个《切韵》的拟音，该拟音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古代汉语”语音系统为准。该著作的中文译本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于1940年合力编译完成。

给出的拟音形式提供了方便、公认的，且以《切韵》音系为参考的读音。如无法明确它们作为任何一种早期汉语构拟形式的有效性或正确性的话，它们不能被标以星号。除非另有说明，《切韵》的拟音是以《广韵》或《切韵》原稿和残卷中的反切读音为依据的。

O（可选择的）

“O”行给出的是一个前古代西北方音（Pre-ONWC）的拟音形式，它代表大约公元280年的语言。这些拟音形式被看作是下一行古代西北方音（ONWC）形式的反“投射”，它们依据竺法护（Dharmarakṣa）译经中的对音数据。竺法护于约公元230年出生在一个大月氏家庭，世居敦煌。^②他的大部分译经完成于公元280年前后，而且他在长安和河西走廊一带积极从事译经活动。竺法护的译经部

^①高田时雄.1988.敦煌资料和汉语史的研究,创文社,东京.

^②Zürcher E.1959.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pp.23, 65-70.

数巨大,《大藏经》(T)在竺法护的名字下列出了其不少于91个字的译经数量,而且这仅仅是他所有译经的一部分。^①但是非常遗憾,他在翻译梵语佛经为汉语时,看似没有转录方式上的个人偏好。他自由地使用已经存在的转录方式,但他自己首选的是“直译”,而不是“翻译”外来词。他甚至“翻译”了著名的《法华经》(T263)!他在翻译时,有时增加汉语注释,这当然对复原原稿有帮助。但是遗憾的是,竺法护译经中可采用的材料相当缺乏。令人有兴趣的是篇幅很小的《法华经》(特别是T585)。很遗憾,据我们所知一些已转录的相当长的《法华经》章节没有梵语原文(T154)。本文引用的佛经材料有以下来源:T61,77,118,154,186,199,263,283,337,345,585,606。没有提供可用的竺法护译经材料时,O行就从条目中被删除。

A 行

专指古代西北汉语方音(ONWC)阶段,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大约400年。这个阶段以长安和河西走廊两个次方言作为代表。如果认为有差异的地方,每个方言类型都给出各自的语音形式。所有的梵汉对音译经材料如下:

BZ: Buddhayasas (中文名: 佛陀耶舍和竺佛念)。梵汉对音材料来自于《大正藏新修大正经》(T)第1经(T1)。这些材料在单篇论文中已经被详细讨论。^②它们可能代表河西走廊方言一种较早期类型(公元4世纪末)。

Km: Kumarajiva (中文名: 鸠摩罗什)。数据来自T 235, 262, 366和T988。对这些材料的讨论见Coblin。^③它被认为代表公元大约400年的长安时期的方音。

Dk: Dharmakṣema (中文名: 昙无讖)。材料来自于T 157, 192和T663。对这些材料的讨论见Coblin。^④它代表河西走廊稍晚时期的一种方言类型(公元大约420年)。

古代西北汉语方音(ONWC)语音形式,以及在B和C两行给出的拟音形式,被认为是D行的反“投射”,它代表一般意义上的沙州(SZ)和晚唐长安时期(LTCA)方音。没有可以引用材料的作为特殊的一行,其构拟形式可从属于同一《切韵》音类其他读音形式中类推获得。

① Zürcher E. 1959.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p.66.

② Coblin W. South.Ms.2. "Remarks on Some Early Buddhist Transcriptional Data from Northwest China." in *Monumenta Serica* vol.42.

③ Coblin W. South.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pp.8-9.

④ Coblin W. South.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pp.9-10.

B行

代表隋唐长安时期 (STCA) 方音, 其构拟形式基本上有两个来源:

Jn: Jñānagupta (中文名: 阇那崛多)。它属于佛经对音, 代表公元6世纪后半期长安地区的方音。最近这些材料已经被尉迟治平 (1982,1985)^① 讨论过, 也见 Coblin (1991)^②。早期做过专门研究的是 Mizutani (1960)^③ 和 Pulleyblank (1965)^④。他们引用的材料基本上来自 T 264,664 和 T1337。此外, 有一些拟音形式引自尉迟治平论文, 采用的阇那崛多的材料代表了隋唐长安时期 (STCA) 方音的早期类型。

YSG: 颜师古《汉书音义》(完成于641年)。包括反切和直音两种注音方法。这些音切材料通常被认为是以同时代长安方音音系为基础的。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 与阇那崛多对音材料代表的方音类型相比, 《汉书音义》则代表长安方音稍晚的类型。大岛正二 (1969—71;1971)^⑤、董忠司 (1978)^⑥、锺兆华 (1982)^⑦ 等人对《汉书音义》做过详细的研究。他们通过仔细分析和比较, 揭示了颜师古相关音注中的大量信息。但是很遗憾, 颜师古音注并不和我们本书所说的情况特别相称。这是因为它里面的音注很多是生僻的或不常用的, 甚至受过教育的人未必能读出来。另一方面, 我们的材料主要由普通或常用词语组成。但是, 列表中给出的一些颜氏音切读音中, 有些是不清楚的。

在我们词条中“反”这个词是传统上颜师古音切的省略。

除上面提到的对音材料外, 我们也有一些佛经的翻译作品, 如采用五十字母的梵文音节的《大乘中宗见解》、阇那崛多、《金刚经》(下面将要讨论) 以及采用四十二字母的鸠摩罗什和阿弥陀经。这些材料被后来的罗常培引用过。^⑧

最后, 我们要提到少量的7世纪的汉藏和藏汉对音材料。当它们出现时, 会被全部辨认。

① 尉迟治平. 1982. 周隋长安方音初探. 语言研究. 2. pp.18-33.

——1985. 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兼答刘广和同志. 语言研究. 2. pp.38-48.

② Coblin W. South. 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 pp.5-7.

③ Mizutani Shinjō. 1960. “Bongo ‘sorishita’ boon o arawasu kanji”. in *Gengō kenkyū* 37. pp.45-55.

④ Pulleyblank E.G. 1965. “The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k an kh in Chinese”. in *AM* 11. pp.199-210.

⑤ Ōshima, Shōji. 1969-71. 颜师古汉语音义の研究. 北海道大学文学纪要[1] 17 (1969):45-238; [2] 19(1971):3-85. 1971. 颜师古汉书音义音类考. *Gengo kenkyū* 59.43-61.

⑥ 董忠司. 1978. 颜师古所作音切之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台北.

⑦ 锺兆华. 1982. 颜师古反切考略. 古汉语研究论文集. 北京出版社. 北京. pp.16-51.

⑧ 罗常培. 1963.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北京. p.64.